

《莊子》在俄羅斯的譯介與出版概述*

A Review of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Zhuangzi* in Russia

鄭曉婷 (Zheng Xiaoting)**

當前有《莊子》俄譯本六種，其中全譯本三種，選摘譯本兩種，編譯本一種。學界普遍知曉波茲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1908-1974) 和馬良文 (В. В. Малявин) 的《莊子》譯本，但對其餘幾種的關注和研究尚屬欠缺。斯卡奇科夫 (П. Е. Скачков, 1892-1964) 和達岑申 (В. Г. Дацьшен) 的俄羅斯漢學斷代史對《莊子》在俄羅斯的傳播鮮有提及。¹ 李明濱的《俄羅斯漢學史》和閻國棟所著的《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均為俄羅斯漢學通史，但其中涉及道家、道教的漢學研究多集中於 19 世紀俄羅斯漢學的「比丘林時期」、「王西里時期」，其時的《莊子》研究還未完全進入哲學思想層面。² 難能可貴的是，閻國棟在介紹當代俄羅斯漢學的發展時對波茲涅耶娃、庫切拉 (С. Р. Кучера, 1928-2020) 和馬良文的《莊子》譯本進行了簡略的風格比較。然而，他力贊「《莊子》以 1985 年出版的馬良文的譯本最為有名」³ 卻是某種程度上的「誤讀」，實將馬良文 1985 年傳記作品《莊子》

與 1995 年全譯本《莊子》相混淆。有鑑於此，全面梳理《莊子》在俄的傳播、譯介和出版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更是釐清俄羅斯《莊子》研究的前提。

一、歐洲譯本階段 (19 世紀下半葉)

俄國人開始知道並閱讀《莊子》是在 19 世紀上半葉。自 17 世紀俄國使團與清政府取得外交和貿易聯繫之後，中俄兩國間的文化交流漸趨密切，歐洲影響和直接接觸成為文化交流的兩大主要管道。18 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 的開明專制和歐洲啟蒙運動思想的影響，促使「中國風」吹進俄國，大量中國典籍以英、法、德等歐洲語言為中介傳入俄國政治文化精英階層。與此同時，從俄國不斷派出的東正教使團深入中國本土，對中國國情和文化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奠定了俄國漢學的基礎。但是，與儒家經典和其他道家

* 本文係中國 2021 年學位點建設與研究生教育立項及研究生高水準學術創新專案「佩列文小說創作與中國文化經典」的階段性成果。

** 作者現為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

1 斯卡奇科夫 (П. Е. Скачков) 著，米亞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編，柳若梅譯，《俄羅斯漢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595；達岑申 (В. Г. Дацьшен) 著，張鴻彥譯，《俄羅斯漢學史：1917-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 330。

2 李明濱編，《俄羅斯漢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頁 46；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85。

3 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頁 180。

典籍諸如《道德經》相比，無論是在歐洲影響下，還是從直接接觸中，《莊子》都不是率先被介紹到俄國的中國經典。《莊子》長時間「沉寂」的原因可歸結為兩點：第一，《莊子》內容蕪雜、篇幅繁長，增加了譯介的難度；第二，儒家觀念中理想化的中國觀已深入人心，莊子的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與孔孟之道矛盾且對抗，為多數俄國人所不理解。然而，經過19世紀的傳播與研究，《莊子》最終被俄國知識分子所接受，《莊子》俄譯也在這一時期開始充分醞釀。

對於19世紀早期《莊子》研究有重要貢獻的兩個俄國人是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和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二人在職業經歷和學術背景上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比丘林是19世紀俄國傳教士、漢學家，被譽為「俄國漢學奠基人」。1808年至1821年，比丘林在北京的東正教使團任職，回國後出版了20多種十分有價值的漢學著作。⁴其中，出版於1842年的《中華帝國詳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一書介紹了中國的道教，並明確地指出道家學說與儒家學說截然不同，但比丘林只重點介紹了老子哲學以及道教產生的過程，並未提及莊子，不過此舉無疑已經是在為《莊子》的登場拉開大幕。瓦西里耶夫又名王西里，是俄國第一位漢學家院士。瓦西里耶夫也曾在1840年至1850年隨俄國東正教使團駐紮北京，回國後在喀山大學任教，著書立說。⁵1873年，瓦西里耶夫在聖彼得堡出版了關於中國宗教的綜合性研究著作《東方的宗教：儒、釋、道》（*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даосизм*），該書由前言和正文六章組成，在「道教」一章中，瓦西里耶夫首次向俄國讀者介紹了莊子其人其作，並摘譯了《莊子》一書中「儒

士們最為反感的一章」，⁶即〈胠篋〉的全文。1880年，在被漢學家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稱作「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⁷的《中國文學史綱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瓦西里耶夫再次評介《莊子》，他以敏銳的視角發現了莊子這一敢於同儒教對抗的道家代表、哲人鬥士，他在〈胠篋〉譯文中介紹了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⁸的批判思想，並指出道家思想中渴望「與精神世界溝通的願望」，以及「創立一種與眾不同的世界觀」的本質。⁹

除了瓦西里耶夫的部分摘譯外，直至19世紀末，俄國並未出現自己的《莊子》譯本，流傳於文化精英之間的三個《莊子》英譯本，分別是巴爾福（F. H. Balfour, 1846-1909）1881年譯本、翟理斯（H. A. Giles, 1845-1935）1889年譯本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1891年譯本。自彼得大帝實施西化改革以來，俄國上層貴族子弟多掌握數門歐洲語言，所以閱讀《莊子》英文譯本並非難事。以理雅各的英譯本為例，該譯本《莊子》（*The Writings of Chuang Tzu*）為英文全譯本，但在出版時並非單行本，而是與《道德經》、《太上感應篇》的英譯一起合成《道家文本》（*Texts of Taoism*）一書，收錄於繆勒（Max Müller, 1823-1900）主編的「東方聖書」系列叢書中。俄國作家托爾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於1893-1895年參與了兩個《道德經》俄譯本的審校工作，在同波波夫（Е. И. Попов, 1864-1938）、小西增太郎（Кониси Масутаро, 1862-1940）一同翻譯校對的過程中，托爾斯泰參考了理雅各的《道德經》英譯本，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接觸到了《莊子》的英譯本。然而，托爾斯泰當時更青睞於中國的孔孟之道和《道德經》，從其日記和書信中並未發現他對《莊子》的直接評論。¹⁰

4 柳若梅等著，《溝通中俄文化的橋樑——俄羅斯漢學史上的院士漢學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頁149。

5 同上註，頁175-177。

6 В. П. Васильев, *Религии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даосизм*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13), с. 80.

7 李福清（Б. Р. Рифтин）著，田大畏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

8 陳鼓應譯注，《莊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頁251。

9 趙春梅，《瓦西里耶夫與中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158。

10 李明濱編，《俄羅斯漢學史》，頁71-75。

二、俄文譯本階段（20 世紀初—1985 年改革時期）

20 世紀初，俄國學者率先對俄藏黑水城文獻《莊子義》予以關注和考察，開啟了《莊子》在俄研究的新紀元。該文本即北宋呂惠卿所著的《呂觀文進莊子內（外）篇義》，為北宋蜀地精良刻本。該文獻是俄國探險家、考古學家科茲洛夫（П. К. Козлов, 1863-1935）於 1908 年至 1909 年間在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境內的西夏古城黑水城遺址中發掘的，現藏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在西夏黑水城文獻被運往聖彼得堡的同一年（1909），俄國東方學家伊鳳閣（А. И. Иванов, 1878-1937）立即投入研究，並於當年發表〈黑水城西夏寫本〉（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в г. Хара-Хото），伊鳳閣的這篇論文及後來的西夏研究論著對於中國西夏學研究具有開創意義。此後，另一位漢學家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1926-2005）也開始對《莊子義》進行研究，他在《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一書中對其作了細緻的描述，包括作者、刻印時間推測、版本外貌、各卷存佚、墨跡、眉批、頁邊手批等情況。¹¹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積累，終於在 20 世紀下半葉的蘇聯出現了《莊子》俄譯本，而且不止一家，分別是波茲涅耶娃 1967 年全譯本、季塔連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2018）1969 年摘譯本、庫切拉 1972 年編譯本。這一時期，隨著對《莊子》研究的深入，蘇聯學界就莊子哲學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唯物與唯心之爭。

波茲涅耶娃是《莊子》俄文全譯本第一人，也因此在此國莊子研究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波茲涅耶娃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漢學世家，其父德米特里·波茲涅耶夫（Д. М. Позднеев）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漢滿蒙語專業，曾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院長（1904-1906），伯父亞歷山大·波茲涅耶夫（А. М. Позднеев）是漢學宗師瓦西里耶夫的弟子，1899 年創

辦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並任第一任院長，1906 年創辦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語學校，即後來的遠東東方學院，是俄國著名的蒙古學家、滿學家、卡爾梅克語專家。在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波茲涅耶娃中學畢業後報考了列寧格勒大學東方語言系，受教於著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院士和當時任教於此的中國翻譯家曹靖華教授。1932 年大學畢業後，波茲涅耶娃在中國列寧學校及國立遠東大學任教七年，期間與時任符拉迪沃斯托克國立師範大學副校長的中國人張錫鑄結婚。1956 年，波茲涅耶娃通過了關於魯迅創作的博士論文答辯，之後便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東方語教研室和亞非學院任教。¹² 波茲涅耶娃是一位集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研究於一身的漢學家，她不僅在魯迅研究領域博採眾長，還深諳中國古代哲學思想。1967 年，波茲涅耶娃的著作《西元前 6-4 世紀中國古代的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家：楊朱、列子、莊子》（Атеисты, материалисты и диалект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Ян Чжу, Лецзы, Чжуанцзы (VI-IV вв. до н.э.)）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發行，印數為 4 千冊。1994 年又由聖彼得堡 21 世紀出版社再版，書名改為《中國智者楊朱、列子、莊子》（Мудрецы Китая: Ян Чжу, Лецзы, Чжуанцзы），發行量升至 2 萬冊。此後 2000、2002、2006 和 2013 年多次再版，2002 年，波茲涅耶娃的譯本還入選《道：和諧世界》（Дао: Гармония мира）道家文集，全書 864 頁，由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出版。1967 年版的《莊子》譯本同《列子》譯本一道出版，又因《列子》第七章為「楊朱第七」，所以從書名到序言、註解就變成了對楊朱、列子、莊子三位哲學家的介紹，但在這本 400 頁的著作中，《莊子》譯文獨佔近 200 頁。作為專業文學研究者出身的波茲涅耶娃，在翻譯過程中十分注重對《莊子》獨特文學風格的呈現，她的譯風自由飄逸，大有莊子之風。同為《莊子》譯者的季塔連科後來評價波茲涅耶娃「試圖意譯所有的文本，這使得她的譯文不僅形象鮮明，同

11 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頁 209。

12 李明濱，〈波茲涅耶娃的學術成就和對中俄文化交流的貢獻〉，《中國俄語教學》2008.4：27。

時又有些奇怪」，¹³如波茲涅耶娃翻譯的人名有「來自南郊能控制情感的人」、「超然的秦」、「無羞之人」、「獨腳愚人」、「否定靈魂的徐」。無論如何，波茲涅耶娃對各篇章標題及專有名詞的俄文譯法為後人提供了重要參考。

在《莊子》譯本序言中，波茲涅耶娃首先介紹了中國哲學研究的傳統、漢學家代表以及蘇聯時期出版的研究專著，然後提出楊朱、列子和莊子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波茲涅耶娃引用阿列克謝耶夫的話：「這本書（《莊子》）在中國的魅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從未失去對中國智慧的統治地位，時至今日，在中國人的意識中還保留著對這部天才作品的鮮活記憶和迷醉感情，那是時間所磨滅不掉的。」¹⁴並且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開篇引用《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干縣令」¹⁵為例，來證明閱讀《莊子》的重要性。此外，波茲涅耶娃還詳細介紹了莊子生平、《莊子》的篇章結構和思想特色。¹⁶

1969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推出的《世界哲學選集》（*Антология мир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收錄了季塔連科的《莊子》選摘譯本。季塔連科是中國學者十分熟悉的俄羅斯漢學家，他曾於1957年至北京大學學習，師從馮友蘭先生，1959年至1961年在復旦大學學習並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在蘇聯外交部及駐上海領事館、駐華大使館工作，1997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2003年當選院士，2006年至2010年主編了五卷本《中國精神文化大典》（*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其多部專著已被譯成中文。¹⁷季塔連科不僅是研究國際關係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專家，他對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也頗有建樹，對《莊子》的譯介就表明了這一點。

在介紹《莊子》的導言部分，季塔連科圍繞著《莊子》中的「道」、「德」、「自然」等重要概念進行闡述，總結莊子哲學是一種具有相對性的神秘主義學說，季塔連科一反前人將莊子視作唯物主義者的論調，具有一定的學術意義。他摘譯並注解了《莊子》中的很多篇章，尤其對〈齊物論〉、〈大宗師〉、〈知北遊〉等做了詳細的譯介，¹⁸這對之後《莊子》的研究和翻譯工作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

1972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版了由布羅夫（В. Г. Буров）和季塔連科等人主編的《中國古代哲學》（*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兩卷本，文集收錄了庫切拉的《莊子》編譯本。庫切拉是波蘭裔蘇聯及俄羅斯漢學家，曾於1953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返回波蘭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1966年之後移居莫斯科並在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擔任教授。對於庫切拉的《莊子》編譯本，中國學界一直缺乏關注和研究。實際上，庫切拉是俄國參照清代王先謙注本《莊子集解》譯介《莊子》的第一人，並且庫切拉的譯本生動、準確，為後來馬良文的《莊子》全譯本提供了直接的借鑒。《中國古代哲學》第一卷共363頁，《莊子》在全書的第248-294頁。庫切拉以《莊子集解》為藍本，對〈逍遙遊〉、〈齊物論〉、〈大宗師〉、〈秋水〉、〈至樂〉、〈知北遊〉、〈天下〉七篇做了編譯。在前言中，庫切拉引用《史記·七十列傳·老子韓非列傳》中對莊子的評說，認同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¹⁹的觀點。雖然此前波茲涅耶娃的《莊子》全譯本已出，但正如庫切拉所言，他的《莊子》編譯本「為讀者

13 瑪瑪耶娃（Н. Л. Мамасва）主編，李志強，張冰等譯，《俄羅斯漢學的基本方向及其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232。

14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8), с. 28-29.

15 陳鼓應譯注，《莊子今注今譯》，頁676。

16 Чжуан-цзы, Пер. с кит. Л. Д. Позднеевой, *Атеисты, материалисты, диалект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Ян Чжу, Лецзы, Чжуанцзы (VI-IV вв. до н.э.)*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7), с. 5-39.

17 陳蕊編著，《國圖藏俄羅斯漢學著作目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37-138。

18 Чжуан-цзы, Пер. с кит.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Антология мир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 1. Ч. 1.*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67), с. 210-217.

19 司馬遷，《史記》，文白對照版（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頁1994。

瞭解莊子的哲學思想、論證方法、意識倫理觀點、文學風格和總體的道家哲學提供了一定的契機。」²⁰

在《莊子》譯介與出版恰逢熱潮的階段，蘇聯的漢學界展開了關於莊子唯物與唯心的爭論。20世紀30年代以來，受歷史背景的影響，蘇聯漢學家彼得羅夫（А. А. Петров）和《道德經》譯者楊興順（Ян Хиншун）一致認為莊子是唯物主義者。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的俄國，孔子的思想被打上反革命和唯心主義的烙印，而與儒家對立的道家就自然而然地被視為具有唯物性和進步性的哲學思想。²¹及至1967年波茲涅耶娃推出首個《莊子》俄文全譯本，她更是使用「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家」來定義莊子，並認為莊子的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是對老子和列子唯物主義思想的繼承。庫切拉1972年《莊子》編譯本中對「天」的解釋也充滿唯物主義色彩。幾位譯者依據〈知北遊〉中「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來斷定「氣」是運動著的細微物質，而萬物都是「氣」的變化。於是，老莊思想作為一種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在蘇聯逐漸被接受，追隨這一觀點的學者還包括科茲洛夫斯基（Ю. Б. Козловский）、費奧科基斯托夫（В. Ф. Феоктистов）、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和庫利科夫（В. С. Куликов）等人。²²但還有一部分學者支持莊子是「唯心主義者」或「客觀唯心主義者」的觀點。他們往往從「道」的概念入手，將其理解為代表和諧、中心和至高無上的本體，可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同。季塔連科在1969年版《中國古代哲學》一書中強調了莊子的唯心主義傾向，「莊子加強了對『道』和『德』的唯心主義闡釋。在他的學說中包含著許多對相對主義和神秘主義因素的認知。」²³可見，季塔連科繼承了其中國老師馮

友蘭的觀點，把道作為一種精神實體或概念，而這個概念式的道又陷入了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²⁴此外，認為莊子並非唯物主義者的還有學者瓦西里耶夫（Л. С. Васильев）和李謝維奇（И. С. Лисевич）。²⁵不僅是研究者和漢學家，目前將莊子視為神秘主義者的俄國讀者也不在少數。當然，也有人認為不應當對莊子做出非「唯物」即「唯心」的定性，因為中國古代哲學各流派中的「精神」和「物質」向來都是不可分的。

三、多元譯本階段（1985年改革至今）

1985年4月，戈巴契夫在蘇共中央四月全會上首次提出「改革」思想，並在198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七次正式確立「新思維」的改革路線，其內容主要包括「公開性」、「民主化」和「多元論」，戈巴契夫的改革波及蘇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層面，就圖書出版業而言，為其發展營造了一個更為寬鬆的社會氛圍。《莊子》的譯介和出版繼20世紀下半期的解凍時期之後，迎來了又一個高潮。

自1985年改革至今，最受矚目的《莊子》譯本共有三個，分別是蘇霍魯科夫（В. Т. Сухоруков）1987年《莊子》摘譯本、馬良文1995年《莊子》全譯本以及維諾戈羅茨基（Б. Б. Виноградский）2010年《莊子》全譯本。從譯者的學術背景和研究目的來看，馬良文和蘇霍魯科夫的《莊子》譯本繼承了俄國漢學的學院派傳統，屬於學術譯介，而維諾戈羅茨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在俄民間的傳播者，其《莊子》譯本被認為是民間譯介的代表。

20 Чжуан-цзы, Пер. с кит. С. Р. Кучеры,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Т. I*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2), с. 249.

21 А. А. Петров, *Очерк философии Китая, Китай.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 геро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0), с. 248-272.

22 А. Л. Мышинский,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советской даологии 1917–1985 гг.)*,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2015.1): с. 372.

23 В. В. Соколов, *Антология мир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4-х т., Т. I., Ч. I*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69), с. 210.

24 馮友蘭，〈先秦道家三派的自然觀的異同〉，《哲學研究》1959.4：38。

25 А. Л. Мышинский, *К истор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советской даологии 1917–1985 гг.)*, с. 372-373.

蘇霍魯科夫生於伊爾庫茨克，1955年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1964年曾在北京大學進修，1968年獲語言學副博士學位，1961年至2003年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任職。²⁶1987年，莫斯科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李謝維奇主編的《哲人文選：中國古代散文》（*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 Проза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其中就收錄了蘇霍魯科夫的《莊子》俄文摘譯本。《哲人文選：中國古代散文》全書共351頁，「莊子」部分在第79-113頁，該版的發行量為5萬冊。蘇霍魯科夫的《莊子》摘譯本包括對〈齊物論〉、〈養生主〉、〈大宗師〉、〈馬蹄〉、〈胠篋〉、〈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徐無鬼〉、〈則陽〉、〈外物〉、〈讓王〉、〈列禦寇〉的翻譯共19篇，其中既有全篇翻譯，也有段落節譯。²⁷同季塔連科的摘譯本相比，蘇霍魯科夫的譯本更加全面和準確。此外，在這本文選中還收錄了由蘇霍魯科夫譯的《論語》、《孟子》、《禮記》、《道德經》、《列子》等中國經典。

馬良文1972年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曾先後在新加坡、日本、中國、美國、法國、臺灣等地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目前馬良文擔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並在莫斯科國立高等經濟大學任教。²⁸其實，早在《莊子》全譯本誕生之前，馬良文就已經對《莊子》進行了十幾年的研究。1982年，馬良文的學術文章〈莊子哲學：遺忘的覺醒，沉默的話語〉（*Философия Чжуан-цзы: Забытые пробуждения, немое слово*）被收入《中國的道和道教》（*Дао и даосизм в Китае*）一書。²⁹1985年，莫斯科科

學出版社推出「東方作家和學者」系列叢書，其中就包括馬良文的專著《莊子》。這本書更像是一本基於《莊子》內容的人物傳記，但又不乏思想性和文學性，僅從標題「莊子的面具，人的面孔」、「時間的地平線」、「暗鏡」、「不為人知的莊子」來看，就十分吸引人³⁰。作者對莊子個性、哲學觀的把握比較精準，莊子隱士般的逍遙之風對包括俄羅斯當代作家在內的很多讀者都產生過影響，該書被瑪瑪耶娃（Н. Л. Мамаева）評價為「對深刻理解早期道家思想極有益的貢獻」。³¹此後，馬良文埋頭苦譯，終於「十年磨一劍」，在1995年完成《莊子》的俄文全譯。³²多年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繼波茲涅耶娃之後最權威的《莊子》俄文全譯本。馬良文的《莊子》譯本是根據郭象《莊子注》所做的翻譯和注解，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莊子思想的原生態。2000年之後，馬良文的《莊子》譯本在俄羅斯被各大出版社爭相再版，2004年，馬良文對譯本進行了修訂，由莫斯科 АСТ 出版社再版，以「新譯文，新觀點」³³的姿態走進讀者視野。

維諾戈羅茨基1979年畢業於遠東國立大學的東方語言系，著有多部中國歷史和民族文化的書，翻譯過大量中國經典文獻。³⁴1996年，維諾戈羅茨基在莫斯科的「埃爾米塔什花園」經營的一家茶文化俱樂部，結識了許多同樣愛好中國文化的俄羅斯同胞。維諾戈羅茨基對中國的興趣十分廣泛，他在哲學、占卜、風水、茶道、功夫、道家養生術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詣，但這又因此導致他無法就某一具體領域做出研究型成果。所以，與其說維諾戈羅茨基是漢學家，不如說他是一位中國文化的推廣者和傳播者。有趣的是，早在1994年維諾戈羅茨

26 陳蕊編著，《國圖藏俄羅斯漢學著作目錄》，頁50。

27 И. С. Лисевич, 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 *Проза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7), с. 79-113.

28 陳蕊編著，《國圖藏俄羅斯漢學著作目錄》，頁132。

29 В. В. Малявин, "Философия Чжуан-цзы: Забытые пробуждения, немое слово," *Дао и даосизм в Китае*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2), с. 39-59.

30 В. В. Малявин, *Чжуан-ц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309 с.

31 瑪瑪耶娃（Н. Л. Мамаева）主編，李志強，張冰等譯，《俄羅斯漢學的基本方向及其問題》，頁228。

32 *Чжуан-цзы. Ле-цзы*, Пер. с кит. В. В. Малявин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5), 439 с.

33 *Чжуан-цзы*, Пер. с кит. В. В. Малявина (Москва: АСТ, 2004), с. 5.

34 陳蕊編著，《國圖藏俄羅斯漢學著作目錄》，頁84。

基便與馬良文合作編寫了《道家哲學文選》(Антология дао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而其中的「莊子」章節由馬良文執筆。正是從 90 年代開始，維諾戈羅茨基著手翻譯中國典籍，已經出版的有《易經》、《道德經》、《論語》、《黃帝內經》、《莊子》等，同時也不乏《道家長生煉丹術》、《煉丹術之變化》、《奇門遁甲》此類道教書籍。2010 年，維諾戈羅茨基翻譯的《莊子》由莫斯科沃蘭特出版社發行，2016、2019 和 2020 年又由莫斯科埃克斯莫出版社再版，其中 2019 年精裝珍藏版的《莊子》俄譯本售價高達兩萬餘盧布。維諾戈羅茨基的譯文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中文姓名在俄語中一般採用音譯法，然而維諾戈羅茨基把「莊周」譯為“Круг Силы”（力量之周），對讀者的理解造成一定的障礙，他還將譯本的書名定為《莊子：知識和權力之書》(Чжуан-цзы. Книга о знании и власти)。正如譯者在前言中所承認的那樣，自己「並未逐字逐句進行翻譯，而是一種現代語言的轉述」。³⁵因而他的《莊子》譯本同他的《道德經》譯本一樣，被認為「看上去不像是譯文，聯想和發揮的色彩太濃」。³⁶

另外，新時期《莊子》俄譯的多元性還體現在對話上，即中俄學者和出版社在《莊子》譯介與出版上的合作。2009 年，中國大陸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漢俄對照的全兩冊《大中華文庫·莊子》，該書以清代郭慶藩的《莊子集釋》為底本進行校點和今譯，俄譯借鑑了當時的俄文全譯本和選譯本，是一本真正意義上中俄合璧的譯本。2018 年，莫斯科機遇出版社推出了「中華經典故事」(Поднебесная в рассказах) 系列叢書之《莊子故事》(Притчи Чжуан-цзы)，該書的中文作者為薛飛(Сюэ Фэй，音譯)，俄語譯者為塔拉先科(М. В. Тарасенко)，該書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對《莊子》進行轉述，更適於青少年在內的俄國大眾讀者的接受。

四、《莊子》俄譯的特點

縱觀《莊子》在俄國的譯介和出版史，可以總結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莊子》在俄國的傳播與政治、文化精英密切相關。在中俄兩國文化交流的初期，由於《莊子》與儒家思想鮮明的對抗使得《莊子》未被率先接受，但在傳教士、漢學家的影響下，其研究後來居上。20 世紀 50 年代解凍時期和 1985 年後改革時期為《莊子》俄譯本的誕生提供了適宜的時機；第二，俄國《莊子》譯介和研究團體的構成十分多元，既有早期的傳教士、外交官，也有蘇聯時期中國哲學、文學的專門研究者，還包括一部分中國文化的愛好者，他們大多擁有在中國旅居的經歷，和中國學者保持友好的學術聯繫，對待《莊子》的觀點與中國研究者基本一致。例如，俄國學者也認為只有《莊子》內七篇是莊子所作，且撰寫時間很可能早於《道德經》；第三，俄蘇漢學領域對《莊子》的認識總體表現為動態發展的過程，20 世紀 30-70 年代就莊子展開的唯物和唯心之爭，引起蘇聯學界對《莊子》研究的重視；第四，文學中心主義是俄國社會所特有的文化核心，《莊子》俄譯者和研究者大都十分重視《莊子》的文學性，認同莊子「哲人一詩人」(философ-поэт)³⁷的身分。《莊子》所蘊含的寓言、辯論以及莊子哲學的神秘主義特徵給俄羅斯當代作家帶來很大的啟示，後現代主義作家佩列文(В. О. Пелевин)就曾多次在小說創作中借《莊子》來表達自己「虛空」的世界觀：長篇小說《夏伯陽與虛空》(Чапаев и Пустота)論及「世界在不停地退化，從某個黃金時代逐步走向黑暗和蕭條」，³⁸是對〈天運〉、〈庚桑楚〉中莊子倒退的社會觀的延伸；短篇小說《下凍原》(Нижняя тундра)中「莊子說，『足不出戶，而遊乎九州』」³⁹是對「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35 Б. Б. Виноградский, Чжуан-цзы. Книга о знании и власти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16), с. 2-3.

36 閻國棟，《俄羅斯漢學三百年》，頁 179。

37 Чжуан-цзы, Пер. с кит.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Антология мир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 I. Ч. 1, с. 210.

38 佩列文(В. О. Пелевин)著，鄭體武譯，《夏伯陽與虛空》(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頁 336。

39 В. О. Пелевин, Все рассказы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05), с. 381.

辯，以遊無窮者」⁴⁰的轉寫；長篇小說《無敵者索緒爾》（*Непобедимое Солнце*）的首尾反覆提及「莊周夢蝶」的寓言，「『蝴蝶之夢為周與』究竟是什麼意思？說的是蝴蝶夢到了它所知道的一切人，夢到了它所見到的古代中國和整個宇宙。為了變成莊子，蝴蝶需要想像出整

個世界」。⁴¹這說明俄羅斯知識份子對《莊子》哲學思想的解讀已經由「想像式」、「印象式」過渡到了「引典式」，即基於《莊子》文本的再創作，而這一切都得益於《莊子》在俄譯介與出版方面的良好發展。

40 陳鼓應譯注，《莊子今注今譯》，頁16。

41 В. О. Пелевин, *Непобедимое Солнце*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2020), с. 681-682.

即將出刊

漢學研究

第40卷第1期（2022年3月）

目次

專論

- | | |
|-------------------------------------|-----|
| 阿蘭若考——以漢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為基本資料 | 屈大成 |
| 敦煌永隆本《文選》〈西京賦〉抄寫底本問題新證——兼論李善作注的底本問題 | 錢璋東 |
| 湯賓尹與晚明制藝八股文的流行及傳說 | 張藝曦 |
| 從玉器和佛教看乾隆皇帝的文化統治 | 王崇齊 |
| 淨土接紅塵——清代廣州海幢寺的經僧群體、刻書事業與社會網絡 | 楊文信 |
| 論晚清小說裡的鐘錶暨其時間再現 | 張日郡 |
| 會戰鬥的南洋「野草」——論雲里風的《野草》仿作 | 張康文 |
| 「畢」「竟」與「畢竟」的語法化探究 | 王錦慧 |

書評

- | | |
|---|-----|
| 評 Yugen Wang 王宇根, <i>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 (1090-1139)</i> | 周睿 |
| 評 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 | 藍弘岳 |
| 評 宋灝《漢學與跨文化思維》 | 黃冠閔 |